

从支持到限制

——论国民党对非基督教运动政策的转变(1924~1927)

陈海军*

本文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国民党在反帝的时代背景下,深深地卷入了非基督教运动,支持和推动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逐渐放弃了其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支持立场,转而改为限制和约束。

本文以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和非基督教运动(以下简称“非基运动”)的关系为考察对象。学术界目前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少,有关的论著限于简单讨论国民党个别领袖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从党的层面讨论其与非基督教运动关系的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已有的一些研究,仅仅是论断性的简略叙述,且由于史料工作做得不足,观点讹误甚多。

1924年以后重新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不仅与上世纪20年代中国民众(包括一些精英分子在内)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化身的模糊认识存在密切联系,与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以后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而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以及开始重视民众力量亦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国民党的这些变化,不仅事实上为非基运动的重新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亦为其自身最终确立支持和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政策提供了可能。

在非基运动的第一阶段(1922.3~1924.3),国民党人就已经参与其中。1922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于3月21日发表了由李石曾、萧子升、李大钊、缪伯英等79位师生签名的通电。3月24日以后,学界名流蔡元培、王星拱、吴虞等亦接踵而至,加入注册。此外,“名册尚

* 陈海军,山东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成果,项目编号为15YJA860001。



未收回而实已加入者，有汪精卫、胡汉民、张浦泉、陈独秀及北大各校教职员数十人”^①。在这些非宗教运动（实际为非基督教运动）的早期参加者中，我们也许会很惊讶地发现著名国民党人的身影：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胡汉民。

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了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1924年7月中旬以后，中国各地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运动日渐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在此时再度兴起，显然是受到了反帝大同盟运动的影响。1924年8月13日，上海100余名反教人士举行会议，宣布重建“非基督教同盟”。会议的发起人是柯柏年和吴稚晖，与会者推柯柏年、高尔柏、唐公毅、张秋人、徐恒耀为同盟执行委员。除了执行委员之外，同盟中比较活跃的有廖仲恺、汪精卫、师复、邹鲁、杨贤江等。会议通过了由廖仲恺、吴稚晖等人草拟的同盟简章，并制订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的计划。在这里，我们再度看到一些重要的国民党领袖参加了非基督教运动，他们是吴稚晖、廖仲恺、汪精卫，而非基同盟的执行委员高尔柏、徐恒耀也是国民党员。

在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人活跃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前沿。1926年9月，广州反文化侵略总同盟筹备在9月25、26日两天在广州市各校举行反文化侵略演讲，其名单列举的主讲者为何香凝、恽代英、于树德、邓颖超、陈其□、周德来、黎樾庭、甘乃光、曾济宽、丁维汾、崔熹、莫沧白、郭寿华、陈兆煌、潘考鉴、王克欧、李振、黎兆葵、吴□民、区梦觉。^②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的国民党政治领袖，如何香凝、黎樾庭、甘乃光、丁维汾。1926年12月21日，广州各界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运动周筹备会决议“于耶稣诞日前后作大规模之反抗文化侵略运动”，“廿五日晚七时并举行游艺演讲大会……演讲者：中山大学礼堂戴季陶、许崇清、甘乃光、周恩来，河南戏院韩麟符、任卓直、黎兆葵、陈家葛，西关宝□戏院施存统、黎樾庭、余鸣鸾、郭寿华”。^③其中著名的国民党领袖有戴季陶、许崇清、甘乃光、黎樾庭。

而《教务杂志》在1925年4月也指出，国民党人积极参加了非基督教运动：“（国民党的）许多领袖，如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吴稚晖、张继、戴季陶和陈独秀，都纷纷表态，或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强烈地反对基督教。他们在学生中都有很强的影响。”^④

① 1922年3月28日《晨报》。转引自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② 《广州市各校之反文化侵略大演讲》，1926年9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

③ 《大规模之反抗文化侵略运动》，1926年12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

④ Y. L. Lee,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ant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25, p. 22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国民党人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参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对待非基运动的认识,确实也存在重大分歧。以廖仲恺、吴稚晖、汪精卫、蔡元培为代表的反教领袖主张反对基督教。以孙中山、徐谦、孙科为代表的一派对非基督教运动持反对态度或有保留意见。由此,在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对于这一运动,国民党一直未形成统一的党的立场,处于超然旁观的位置。而到了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却通过大会宣言以及两个重要决议案对基督教进行严厉的谴责,反基督教最终获得承认,成为党的立场。

问题在于,这种分歧是如何最终被消弭,而反教是怎样最终在1926年成为国民党的党的立场的?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广东在1924~1925年的形势。没有一个政策能够脱离它的时代,国民党的非基督教政策也是如此,它是1924~1925年全国尤其是广东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增长的革命氛围与反基督教

近代以来的广东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由于得风气之先,整个广东地区思想开通,革命力量也相对比较壮大。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和华南最大的城市,革命形势尤为活跃,辛亥以来没有一个军阀能够在广州建立起稳固的统治。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1924~1925年的广东形势,用“风雷激荡”来形容并不为过。1924年以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对外联合苏俄,对内与共产党实现国共合作,扶助农工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广州和广东全省革命形势的发展。1924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稳定了广东地区的革命秩序,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1925年尤其是1925年下半年开始,广东不断发生重大事件,革命形势剧烈发展,革命气氛迅速高涨。

1925年2月起,黄埔军校学生军奉命对陈炯明进行第一次东征,至3月24日,东征军已克五华、兴宁、梅县等地,予陈炯明部队以彻底打击,极大地振奋了人心。6月6日,东征军奉命回师讨伐叛乱的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6月13日,刘杨叛乱被迅速平定。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的胜利,使广州革命政权更加巩固,为改组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创造了条件。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中山的逝世对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来说都是重大损失,但是,为悼念孙中山所举行的纪念活动却进一步强化了广州的革命气氛。

5月30日,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迅速引发反对帝



国主义暴行的强大抗议运动——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以后，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举行罢工，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帝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邓中夏指出：“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①五卅运动对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张太雷 1926 年 5 月指出：“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在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广东省的统一，正在省港罢工与香港帝国主义相持中。在五卅运动使帝国主义惊慌失措的时候，南方革命基础于是建立而健强。广东革命基础是五卅运动的产儿。”^②

6 月 2 日，广州人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同胞。6 月 19 日，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 10 多万工人和部分学生、商人举行援助上海同胞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罢课和罢市，并陆续返省坚持斗争。6 月 21 日，广州沙面租界的工人以及英日美洋行的职工和各行业工人举行反帝罢工。省港大罢工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6 月 23 日，广州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共 10 万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的时候，英法军队从沙面租界开枪扫射，军舰也发炮轰击。当场打死 52 人，重伤 170 余人，轻伤无数，造成沙基惨案。沙基惨案激起了广东更大的反帝怒潮。6 月 29 日，香港工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工人数达到 25 万，省港大罢工坚持达到 15 个月之久。邓中夏指出：“幼弱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更是得到省港罢工的帮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③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亦指出：“省港罢工坚持十五个月之久，其最大功绩是帮助革命政府肃清反革命派，截断香港牵制广东的影响及对反革命的接济，如此，使革命基础坚固起来，为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建立了一个大本营。”^④

在强烈的反帝浪潮中，广州国民政府亦正式成立。6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7 月 1 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8 月 2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的成立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广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逐步得到了统一。

8 月 20 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在追查廖案的过程中，右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8 页。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 1 卷，第 63 页。

③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3 页。

④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第 700 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派势力受到打击,国民党呈现全面左倾化,这进一步强化了广州的革命气氛。9月28日到11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收复东江地区,全歼陈炯明部队。在东征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又对控制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进行南征。到次年2月克复海南岛,至此,革命势力统一了广东全省。

1925年尤其是这一年的下半年,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革命形势剧烈发展,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一步步增强和催化了广东的革命气氛。刘少奇曾经描绘过五卅期间上海强烈的反帝气氛:“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①而1924~1925年间的广州并无多少不同,据国民革命亲历者回忆:“在充满革命气氛中的广州,随处可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口号声,到处可见各种介绍革命理论的刊物。”^②强烈的革命氛围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置身其中的领袖、民众非常狂热、冲动,很容易作出和平时不轻易作出的决定。这就使我们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党内存在分歧的情况,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非基运动能够得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赞许和支持,从而使反基督教成为其党的立场,而不再只是第二阶段非基运动开始时期的党员或小团体对运动的支持。

除了广东1924~1925年逐步强化的反帝革命气氛赋予非基运动以合法性以外,1925年的五卅运动亦对非基运动直接起到促进作用。五卅运动以反帝国主义为号召,通过运动自身强大的影响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恽代英指出:“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③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直接深入到偏僻乡镇,扩散到每个社会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和拥护。五卅反帝运动在自身获得巨大支持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具有相同宗旨的非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6月13日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即指出:“我们要知道,上海、汉口市民的举动和被惨杀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历年压迫中国国民所激起的反抗爆发之表现。外人说我们为排外,我们确是要排外。但是我们要排斥的外国人是专以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压迫欺压中国人民和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各省区乡镇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9页。

②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48)》,第98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5~16页。



的人民,无不受尽他们政治经济上的侵略和压迫。他们还要用伪善的基督敎义,来达到思想上奴隶中国青年界的目的。这种文化侵略的阴谋,最近一年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① 这表明,五卅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许多以外,还有一个是强化了非基运动的合法性,直接促进了非基运动的发展。

在反帝运动持续高涨的影响下,广东的非基运动迅速发展。6月2日,广州民众举行声援上海同胞的示威游行,“就有培正、圣心教会学校的学生激于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同胞的义愤,冲破教会学校的牢笼,毅然参加巡行”^②。6月23日,广州的工人、农民、军人及学生再次举行规模巨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有更多的教会学校学生列队参加,培正、培英、圣心等校的队伍更为整肃,连平日绝少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岭南大学,也有学生参加”。由此足见五卅运动催生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巨大影响。6月25日,由美国洛克菲勒教育基金会资助并接办的广东公医医科大学学生举行请愿活动,要求政府收回公医。当日,广东革命政府宣布收回公医。收回公医系收回教育权的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广州各教会学校学生的斗志”^③。此后广州南关中德学校学生宣告全体退学,圣三一学生再度掀起罢课退学运动,坚持一月有余,使学校被迫于9月开学时停办。东山三育学校反对以圣经为科目而发生风潮,圣心学生800余人组织外交后援会,同时办理退学事宜。岭南大学也出现风潮,甚至基督教青年会也举行各种公开的救国演讲。广州著名的基督徒李应林为沙基惨案专门编纂了一本小册子,叙述事件的经过,谴责帝国主义“这次惨杀的无公理和无人道”。到年底圣诞节前后,广州的非基运动再度掀起风暴。12月18日,广东反基督教总同盟在广东大学礼堂成立。决定于25日举行大游行。12月25日,广东反基督教总同盟发起组织全市性大规模反基督教宣传活动,张贴、分发标语、传单2万多份。12月25~27日,汪精卫、陈公博与袁振英接受邀请在广东大学礼堂发表反基督教演讲,现场听众甚至连站立都很拥挤。^④

这些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集中发生在五卅及沙基惨案之后民族主义情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185~186页。

②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48)》,第107页。

③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48)》,第109页。

④ 参见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48)》,第109~111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绪高涨的1925年下半年；第二是事件频发，高于1924年份的发生频次^①；第三是规模大，基督教徒、教会学生参与程度高。三个特点充分体现了持续高涨的反帝运动对非基运动的促进作用。而非基运动的持续深入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广东的革命氛围，加强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和支持非基运动的可能。

而原来在非基运动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国民党这时亦开始公开予基督教以谴责。1925年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对五卅事件宣言，指出：“五月三十日之惨剧，英捕房以对待盗匪敌军之枪弹，对待我争自由保主权、无抵抗之学生工人与市民，其残酷蛮横，视庚子年之拳匪行动尤甚。乃犹强以排外赤化名词污辱华人，淆惑世界观听，其言行应为崇奉耶教爱自由独立之撒克逊人所羞为。”^②7月11日，胡汉民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身份发表《为要求各国人民主持正义赞助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发表告世界各国人民书》，谈到：“在这同一租借地上，又把那从无人道的剥削我国人民来的金钱用之于所谓教育中国青年之事业，实则是使中国青年受恶化而堕落。因此他们可用之以进行他们剥削我国之可恨的计划，不管他们把这种教育说得怎样人道主义，其结果则极明白，即我国的一部分人民堕落为压迫的工具。”^③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宣言，宣布对英法实行经济抵制，其内容为：“1. 不买英法货；2. 不收英法纸币……8. 不入英法人之医院、学校、教堂，不任英法学校教师和医院医生；9. 不与英法人交谈通讯。”^④在这里，国民党已经逐渐明确了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而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反基督教将最终获得国民党的正式承认。

二、国民党反基督教政策的正式确立

本文认为，将反对帝国主义奉为党的纲领的国民党对于以反帝为基本内涵的非基运动必将出于意识形态的接近性而予运动以支持，并且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认识亦增强了这种趋势。但是鉴于反基督教与“信教自由”此类国民党所一直信奉的自由民主信条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党内的分歧，这种趋势要转化为国民党正式的立场还需要有适当的助推力量。那就是1925年下半年广

① 1924年广州发生的比较重要的非基运动是4月发生的圣三一学潮、5月发生的圣心学潮和年底发生的非基督教周运动。

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0页。

④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第828页。



东及全国剧烈发展的革命形势。

1924~1925年,是国民党反基督教的立场逐步确立的两年。这一阶段中,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地方党部、国民党员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对非基运动给予支持。这种地方的、部门的和个人的立场最终在1926年初上升为党的立场。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曾经有几个团体“提出收回教育权的议案”,成立了广州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表声明主张教会学校不得强迫读圣经和参加宗教集会。^①这表明在1924年初基督教问题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1924年6月19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其间涉及对基督教的立场:“各村中之农民协会,为基本组织……如农民入会时,有左列条款之一者,皆得拒绝其为会员……三、为宗教宣教师者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姑等类。四、受外国帝国主义操纵者。”^②宣言系国民党农民部起草,经国民党中央执会第38次会议决议修正通过,并呈请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表。同年9月7日,国民党发表的《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提到:“除了以上两般之外,还有宗教的侵略。他们用政治力、经济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般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与词讼,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这也是义和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啊!”^③第一个宣言立场显然还很模糊,涉及的问题也很边缘化,《九七国耻纪念宣言》对基督教的谴责也还只是限于历史范畴,都不能够算作正式确立反基督教政策。从这个时候起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甚至像这样的谴责都难以找到,更毋庸言正式的文件,最可能的解释是国民党这个时期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正式支持非基运动。

1925年下半年,五卅运动所带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革命气氛充斥全国,中国民众群情激愤,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一泻千里的革命形势催化之下,1926年初,国民党在1924年到1925年五卅之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非基运动政策终于确立。

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民党内左派势力占据优势,呈现全面左倾化情况下举行的。不仅“革命”“反帝”成为强势话语,甚至连“左倾”都成了令人钦慕的桂冠。右翼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和打击,包括

① 参见洗子恩:《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广东文史资料(45)》,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② 《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518页。

③ 《九七国耻纪念宣言》,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530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汪精卫、蒋介石都以左派领袖自居或被视为左派领袖，包括徐谦在内的许多国民党人积极认同反帝话语，支持以反帝为内涵的非基运动。这成为这次大会能够正式确认反基督教政策的直接原因。^①

1926年1月1~20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发表的宣言指出：“帝国主义者以极少数之本国人民，而能驾驭大多数之殖民地人民，其工具有三：……三、强有力的宣传机关，若千百种之新闻杂志，若千百所之学校，若教会及戴面具的慈善事业，若无数受熏陶于统治殖民地人民的精神之官吏，皆足以以为帝国主义之喉舌与爪牙。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奴隶，不特有摧残的能力，而且有麻醉的作用。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不特能蔽其罪恶，且能使人相与歌功颂德之不暇。”^②

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指出：“大会审查过去两年间之青年运动虽有相当成绩，然亦不少缺点……（五）关于青年宣传刊物绝少，教育方面亦没有顾及，致狭隘的国家主义、麻醉的基督教及封建时代的各种言论把持教育界，浸入到一般平民脑海中，而没有指正的工具。”决议指出：“各地党部应有专门青年宣传刊物，在此类刊物中特别注意反动思想的驳斥及革命的文化之建设。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学生联合，不应站在反对宗教的观点上与教会学生分离。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尤应积极设法收回教育权。”^③

同日通过的《关于党报决议案》明确指出党报应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中国报纸书籍中遇有传播帝国主义的文明，宣扬他们对中国的口头亲善时，本党党报都得加以抨击，不可轻轻放过机会。本党党报不只要指出帝国主义者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更应指出文化的侵略足以破坏国民革命的思想，分裂知识分子的队伍，麻醉一般革命民众的心理。本党党报应特别防止这种危险。”这里的文化侵略，正是就基督教而言的。决议案并且指出了针对文化侵略，党报应该宣传的口号：“关于此点，党报应当宣传以下的口号：……（五）帝国主义者耗费千百万元来克服我们的思想，我们应当很奋勇的战胜他们的诡计。（六）帝国主义者耗费千百万元来传播耶稣教，这是他们破坏我们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很厉害的工具。”^④

① 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陆和台湾的评价各有不同，可以参见秦孝仪：《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第744~746页。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9~100页。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132~133页。

④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147~149页。



国民党二大宣言以及《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关于党报决议案》涉及基督教问题的表态是国民党国民革命期间在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事业问题上的最重要理论阐述，而从国民革命出发来反对基督教的党的立场亦借此得以最终确立。这一立场的基本内涵在此后的北伐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1926年10月15~2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及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宣言指出：“当本党主义在未实现以前，本党应当继续指出人民的痛苦，并于其政权所在地力图实行其政纲。那末，现在中国人民所受压迫与痛苦情形又如何呢？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压迫中国四万万人民，帝国主义者仍旧占据了中国的各通商口岸，以租界为握扼中国咽喉之用，外国银行仍旧操纵中国的金融，帝国主义的学校及报纸仍在中国为帝国主义宣传，以恶化中国的人民，帝国主义的军队与炮舰仍在中国土地与江河内驻扎及行驶，并不断的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仍旧掌握我国的海关。总之，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军事上的特权，仍旧是丝毫未动地存在着。”^①关于基督教，会议通过的《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指出：“一切教会及外人私立学校，须经教育行政机关立案。”^②

三、国民党没有在非基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

国民党没有在第一阶段的非基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关于这一点，杨天宏认为，国民党由于没有“战斗的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它作为一个独立政党支配非基督教运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微弱的。杨天宏并且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中许多领袖人物本身就信奉甚至皈依了基督教，耶稣的精神曾经是孙中山革命事业重要的思想泉源。因此，很难想像国民党在一场纯粹的反教斗争中会发挥多少作用。”^③赵秀丽则认为：“中国国民党内部分歧的存在以及阶级立场的局限，使其不可能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者。相反，也正是因为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革命导致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失败。”^④

国民党究竟是不是由于没有“战斗的唯物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不能领导非基运动，是值得讨论的。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固然可以使得党从无神论的角度确立反宗教（含基督教）的立场，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71页。

②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84页。

③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第294页。

④ 赵秀丽：《早期中国共产党与非基督教运动》，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6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态同样亦可以使国民党在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在本文的论述中已经反复表明,毋庸赘述。国民党之没有在非基运动中充当领导者,有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其他原因。

主观上讲,国民党对积极渲染和强力推进非基运动的影响有所顾忌。民国宪法中明确载有“信教自由”的原则,国民党一向又以护法者自居,自然对于公开强力反对基督教有所顾虑——即使向民众解释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立场上反对基督教也是很不容易说清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它采取了从旁鼓励、支持、引导的态度(详细情况另文论述),支持以民众组织面目出现的非基督教同盟/反文化侵略同盟出面反教,支持国民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党反教,支持具体行政部门、地方党部、地方政府及军队反教,而较少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名义出面反教。正是这种扑朔迷离的局面,给不少研究者造成国民党没有介入非基运动,只是有党员或者小团体参与运动的假象。

其次,国民党缺乏组织民众运动的经验,客观上也使得它在运动中无法发挥领导作用。而共产党由于历来重视民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加之共产党亦有控制非基运动的意愿,所以共产党最终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与操纵者,而国民党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限制,则承担了协助、支持、鼓励的角色。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在其1927年出版的《中华民族革命运动史》中指出,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并不擅长组织民众运动。恽说:国民党员在学生会中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工会方面亦感觉缺少人才,且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国民党员亦不常听见政治报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晓得怎样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去演讲,亦不能动人听闻。”^①这虽然是就五卅运动而言,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说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四、国民党的立场与非基运动的重新定位

本文认为,不仅一般民众,包括作为精英分子的不少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对于帝国主义、基督教都存在模糊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西方国家、基督教、帝国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他们眼中的基督教即等于帝国主义。即少数能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清晰区分的精英分子,亦不能在具体付诸民众行动时做到避免连带打击正常宗教信仰的波及效应。这种对基督教、帝国主义的模糊认识使得护教者拒绝支持非基运动成为当然的反应。实际上,国民党内拒绝支持非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2页。



基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模糊的认识与波及效应并不是贯穿第二阶段非基运动始终的,只是存在于这一阶段的前期(1924~1925年)。

在1924~1927年的发展过程中,非基运动经历了一个相对于第一阶段来说重新定位的问题。1922~1923年的非基运动虽然不乏对基督教充当资本主义侵略工具的指责,但主要是将矛头集中于基督教的信仰层面,谴责基督教是落后的、愚昧的,与科学对立的,麻醉中国人民的。对于基督教的教义讨论比较多,言论中充斥了对基督教信仰、基督徒和教会的攻击。认为需要将作为一个宗教的基督教,也包括其他宗教彻底取消。很显然,这些对于基督教的谴责与攻击是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不能接受的,这种对非基运动的印象必然会带入到1924~1927年重新兴起的非基运动中去。

1924年重新兴起的非基运动,肇端于圣三一学校学生反对校方的压迫,深受国民革命洪流影响的教会学生喊出的口号是收回教育权、打倒帝国主义。但是运动在其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仍然继续像在第一阶段那样谴责基督教的信仰,或者将基督教等同于帝国主义,将其彻底打倒。这是与国民革命的目标不相符合的,不利于争取最广大的民众支持国民革命与革命政府,反而容易制造革命的对立面,其内在的局限是明显的。当时运动的领导者陈家文在1986年撰文的时候,也指出:“(五卅以后)一般学校学生、各青年团体和广大教会学校学生之间,还不能在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的共同目标下达到组织上的联合,这主要是长期以来教会学校和非教会学校之间的隔阂未能消除,同时笼统的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口号使一般的教会学生尤其教徒产生恶感而不易接受,这自然对广州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深入发展不利。”^①非基运动自身这种内在的局限必定会在某个时期使它进行适当调整和重新定位。

从运动的外部因素来说,第二阶段的运动亦是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其初期或者说是国民党员)影响的。1924~1927年的非基运动在其初期因其可用性(吸引了大批民众,矛头指向列强),而受到共产党与一些国民党人的重视,他们除了对运动进行支持与鼓励,对运动也在进行积极引导和控制。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运动并不是自由发展的,是受到国民革命的发起者左右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国民革命发起者也必然要使运动与国民革命的目标协调起来。这是外部力量在按照自己的意图对非基运动进行改造。

这个重新定位与来自外部力量的改造不是第二阶段非基运动刚刚重新兴起

^①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48)》,第112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的时候就能够进行的。虽然重新定位是必然的,但是必须要等到运动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引起运动自身参与者与外在引导者注意的时候才会提上议事日程。等到这种重新定位与改造结束之后,国民党内的反对意见毫无疑问得到了尊重,因为运动回避了基督教的信仰,而保留了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这对于国民党最终给予非基运动以确认和支持是有利的。

这个重新定位和改造是何时进行的呢?廖仲恺早在1924年就已经指出,对于非基运动应该主要从政治立场上进行反对,而不是批评它的教义(即信仰)。1924年12月的广州反基督教运动中,廖仲恺指出:“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去反对的。因为他在中国实挟有一种非法的,优越的势力,像现在中国佛教,回教,一样的地位,我们便不反对他了。若说到牠的教义,玄之又玄,那是辩到世界末日,还是没有结果的。”^①廖仲恺的观点表明国民党人早在运动初期已经认识非基运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据广州非基运动领袖陈家文的记述,“1925年底开始,广州团组织及新学生社就着力纠正过去斗争策略上的偏激,改变反基督教的口号为反文化侵略,使广大青年群众认识明确我们现在反对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他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种方式——文化侵略,所以我们要使教会学生明白这一点,一齐站在反基督教面前,才能有成效”^②。仔细考察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的广州报纸在这段时间内“反基督教”与“反文化侵略”词汇使用的情况^③,即可发现,从1926年三四月间起,“反文化侵略”开始大量在报端出现,原有的“反基督教”词汇则销声匿迹,这标志着非基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重新定位。

所以,站在今天来看,经过重新定位与改造的非基运动实际上与1922~1923年的运动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同样是反对基督教,但是前者是隶属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④,而后者是反帝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

非基运动的这种重新定位,固然是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起主导作用,但亦不能不和国民党二大的对非基运动的要求联系起来。1926年1月的国民

① 招观海:《国民政府下的基督教》,《文社月刊》2卷7期(1927年6月),第24页。转引自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50~151页。

② 陈家文、黄穗生:《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48)》,第112页。

③ 以当时广州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广州民国日报》为样本,该报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在非基运动中刊登了大量新闻报道。

④ 参见赵秀丽:《早期中国共产党与非基督教运动》,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42页。不过赵没有将非基运动划分时期,她认为两种性质在非基运动整个发展阶段是兼具的。



党二大《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明确要求：“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与教会学校学生联合，不应站在反对宗教的观点上与教会学生分离。”^①把运动定义为站在反帝国主义观点上的非基运动，未尝不是对国民党内持保留意见领袖的一种尊重，亦未尝不是国民党对运动的一种有条件的支持——只有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上的反基督教运动才能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非基运动的重新定位，首先是运动自身的自我调适，但也正反映了国民党对运动的规范与引导。

不过，虽然运动经过了重新定义，但是原有的模糊认识仍然在一部分地区、民众之中继续遗留并发生作用（如名称仍为“反基督教运动”）。民众的情绪化和情境化使得运动发展出现超越应有界限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国民党内原有的反对一派对此亦不愿求全责备，对于以反帝为号召的运动也不便予以公开谴责。^②不过这已经是运动的支流，不能影响对全局的评价。

五、从支持到限制：国民党反基督教立场的收缩

1926年7月北伐誓师之后，北伐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在湘鄂战场接连取得胜利，7月12日，进占长沙，10月10日攻克武昌。不到半年的时间，国民革命军就从珠江流域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了“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13日，已经达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决议成立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各地反帝运动迅速高涨，非基运动亦随之出现新一波浪潮。各地教会频频受到冲击，教堂被占，教徒受到攻击，外籍传教士纷纷撤离内地，教会学校相继发生学潮，乃至停办。但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于非基运动已经逐渐改变了昔日赞成和支持的立场。

1927年1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在民众支持下先后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但是对于民众运动，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忧虑。1927年1月8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发布《关于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委会管理市政通电》，要求各地：“各省英人所设教会学校，依教育独立之原则，自当即谋收回，而在政府未定办法以前，实不宜有直接行动。”并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133页。

^② 参见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91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明确指出：“至于各省英人之生命财产，均在政府保护之列，地方当局亦应妥为保护。盖吾所反对者，为整个的帝国主义，而非修怨于私人。”^①这个通电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正在逐步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当时无法控制的民众运动局面的忧虑，希望把包括非基运动在内的反帝运动纳入掌控的愿望溢于言表。剧烈发展的非基运动对于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国民党固然可以通过推动非基运动发动民众，扩大对自身的支持，使国民革命向前发展；但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立场上的反基督教运动毕竟还是不容易在宣传中向民众阐明的——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即是，在运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民众很可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进行非基运动，国民党因此将很可能面临着无法控制局面的风险。

1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派遣的参赞欧玛利抵达武汉，与国民政府谈判处理汉口、九江事件。同日，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广东外交部以及汕头、长沙等地交涉员，要求当双方谈判交涉之际，各地须切实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其中更明确要求不要攻击各国教会，“以免引起各国反感，致碍外交前途”^②。次日，陈友仁致电各省，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对我政府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之设施，极为重视，不能稍有疏虞，致贻口实引起纠纷”，要求各地“对于外人生命财产，务须绝对周密慎重保护，不得有丝毫损害，并积极劝告民众，在此时间，毋再发生反教运动。如有逾轨行动，应即严行制止，免得外交进行，而误革命前途”^③。这两个电文明确表示要在对外交涉期间限制反教运动，从其限制理由看，这个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已经预示国民党在未来对非基运动的政策。非基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容易脱离国民党的控制，而且更容易造成对外交的不利影响。国民党、国民政府此时更希望看到的是秩序与稳定，非基运动不再是革命的助力，而成为“革命前途”的妨碍。

国民党逐渐放弃对非基运动的支持，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国民党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信仰和尊重也不是不需要考虑的。“信教自由”的条款明确载在国民党亲手制定的《临时约法》，即便在将非基运动定义在反帝国主义立场之上，它也仍然可能面临违背信仰的指责与中国基督徒的疑虑。正如韦慕庭所言，“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徒中的名声”^④。

不过由于民众运动此时发展如火如荼，国民政府基于争取民众支持的考虑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613～1614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614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615页。

④ 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2页。



亦不便公开限制,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一方面尽力加强对外侨(含教会、教徒)生命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对民众加强宣传说服,而放弃强行禁止的做法。1927年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会间讨论了如何对待教会要求保护教产的问题,徐谦表示:“他们愿借就借,不愿借不能勉强。若是强迫他们借,于我们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政策很是冲突。”陈友仁说:“现在正是反基督教,还□□□的当儿,结果□保护教会的政策接榜出来,不大妥当,最好是定一个普遍的原则,可以免却许多麻烦。”会议最终决议:“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之内,外人所办学校校舍、教堂及其他房屋,如愿租借者,悉听自由;其不愿租借者,均在受国民政府保护私人财产法令保护之下,无论何人不得强行占据。”^①这个决议反映了武汉国民政府复杂的心态,既不便公开阻止正在进行的反基督教运动,又不愿意影响政府外交的顺利进行。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虽然共产党在非基运动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国民党却并不是在与盟友决裂以后才放弃对非基运动的支持的;第二,国民党放弃反基督教的原因是多重的。

六、国民党非基运动政策中的共产党因素

由于共产党在当时帮助国民党组织地方党部,甚至象湖北这样的省份,省党部全部被共产党员充斥,政策由共产党员制定,行动由共产党员实施。而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与地方也并不是非常悬殊,国民党二大的全部代表中,竟然有3/5来自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亦占据不少重要席位。^②如果因此而得出结论,当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发出的反基督教言论及行动并非纯粹的国民党的立场,也是很自然的。叶仁昌亦指出:“国民党在反教运动中的角色与立场并不容易厘清。主要的原因,是在国共合作下很难辨认什么是共产党的行径、什么又是国民党的作为。许多学者似乎暗示,国民党与反教原本是毫不相干的,是受了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影响才参与反教。”^③

在1928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刊登的来自各地教会的报告中,多处亦明确得出结论,攻击基督教的是中国共产党。如浙江地区的报告指出:“中华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2~1073页。

^② 参见李友仁、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简史(1894~1949)》,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5页。

^③ 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89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教会去年之环境，可云处压迫之境地，受侮辱之待遇，而为一遭试练之时期也。而施以压迫加以侮辱者，非专横之帝制，非蛮暴之军阀，而为尊重忠实基督徒革命大元首孙总理手制党纲之党军、党人、党政府。当时百思而不得其故，而今日则甚明了其为共产党从中作祟。”^①而“及至宁汉一致清党，共产失败，以前炙手可热之非教高潮，于焉渐息，教会亦渐趋于平坦之途矣”^②似乎更证实了反教系由于共产党“煽动”的猜测。

确实，在共产党因素消失以后非基运动归于平息这个事实很容易让我们得出国民党在非基运动中实属“无辜”这一结论。本文前此对国民党与非基运动关系的考察，相信足以让我们否定这个轻易可以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继续考察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中各地党部继续发生的反教行动，更不难得出结论：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地方党部出台反基督教政策，固然有共产党从旁鼓动的原因，更有其自身内在的因素。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明确写入党的宣言之中，并以之为行动的纲领。这是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也没有否认的。考虑到这个因素，那么就能够很自然地理解国民党的许多地方党部甚至包括中央党部为什么在“清共”以后仍然坚持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了。

叶仁昌亦指出：“如果说国民党的反教是受了共产党影响，还不如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反教，都是受了当时反帝的革命热情所影响。”“事实上，反教是出于反帝，与神学及教义毫不相干。……反教者是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外侵的社会暨政治实体，并不管它主张的是有神抑无神。反教是中国革命热情下之排外主义的一部分。当时浓烈的国家主义信念几乎遮掩或泯灭了神学及教义上的区别。”^③

齐鲁大学是华北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1929年，它面临着与北伐过程中其他教会学校几乎一样的混乱局面，那就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因为学生希望像他们那些华南、华中的同学一样打击基督教的“文化侵略”，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则暗中支持、鼓动这个反对校方的运动。《齐鲁大学》一书的作者写道：“学校在1929年秋季开学时，还看不出任何有麻烦的迹象。教师们并不知道一些学会了共产党做宣传鼓动工作的国民党激进分子，已经制定了周密计划，准备在全国各地让教会学校难堪，如果可能，就接收这些学校。后来发现，在济南的国民党山东省委员会，或者叫省党部，下面有一个宣传部已经组织了十多个齐鲁大学的

① 倪良品：《浙江教会现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0）》，1928年。

② 《编辑者言》，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0）》，1928年。

③ 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第89～90页。



学生,指点他们采取不同的步骤,制造麻烦。”^①作者在描述了齐鲁大学在 11 月份所经历的罢课以后,接着指责道,山东省党部宣传部为年底的圣诞节“策划”了新的进攻,“它给它的学生组织发布命令,要他们在圣诞节猛烈攻击基督教”。作者引述了后来发现的宣传部的有关文件:“本月 25 日,是基督教徒们庆祝的圣诞节,他们将要举行麻醉群众的庆祝会。为了反对这种麻醉,宣传部准备了口号,发动一次反基督教运动。”^②显然,这个文件为证实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插手和支持齐鲁学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证实国民党在经历了“清共”之后,没有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放弃了反对基督教的活动。而这新一波的反基督教运动,足以表明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期间的反教并不完全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结果。如在 1929 年 10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的“指导青年会办法提案”中,明确指出:“查各地青年会之组织,全属我国民众集团,而其性质则是以宗教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按其近来,常以似是而非之宗教理论,曲解或附会我总理遗教,更其明证。”^③1931 年 2 月,该部在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中,再度指出:“(基督教团体)在过去每藉宗教宣传为文化之侵略,为患甚巨,虽信教自由本党所许,然应由党部予以适当之指导,政府予以切实之监督,运用其宣传本党党义而纠正其谬误,并严防其文化侵略。”^④对于基督教会实行“文化侵略”的谴责依然没有变化。

再如 1928 年 2 月 6 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公布《私立学校条例》,条例规定:“凡私人或团体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私立学校校长,须以中国人充任。……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私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⑤对照 1926 年 10 月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对于教会学校的限制并没有因为“清共”而有丝毫放松,这对于国民党有自己的反教出发点非常有说服力。1929 年 2 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私立学校规程草案》,其中规定:“私立学校如系宗教团体所设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

① [美]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5 页。

② [美]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第 168 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23 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文化),第 1029 页。

⑤ 《大学院宣布关于私立学校两条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4 卷 1 期(1928 年 3 月),第 82 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学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①这个规定无论是与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的规程，还是与1928年的《私立学校条例》相比，严格程度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国民党自有自己的反教立场。

教会方面也指出：“近几年来反对基督教的声浪很高，大家都以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和资本主义的走狗，仿佛这种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依为命的基督教与新中国势不两立，与国民党尤无妥协的余地，国民党的党员，因此对于基督教由怀疑而攻击的，差不多到处都有。……清党以后，表面上政治部虽没有贴出反教的标语，但骨子里面依旧有非教的心理，比方党部占据教会，即是他们反对教会的表现。”^②

凡此种种，均足以证实，国民党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支持、鼓励立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盟友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从自身政治信仰出发而作出的必然抉择。在这些决定国民党支持非基运动的自身因素之中，国民党自身的政治纲领——孙中山1924年确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其最重要的部分。

^① 《教部公布私立学校规程》，《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5卷3期（1929年9月），第83页。

^② 徐庆誉：《我对于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的管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4卷1期（1928年3月），第23页。